

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錢存訓著 戴文伯譯

翻譯不僅是一門科學或一種藝術，也是人類知識交換和國際文化溝通的一種實際工具。由於近代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接觸頻繁，翻譯的價值更趨重要。西方各國雖然語言各異，但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作為基礎，所以翻譯上的問題，多從語言的觀點來考慮，而無須從文化的差異來探討。至於東西文化的溝通問題，不僅有語言上的障礙，且以文化類型迥異，就困難更多了。

西書的逐譯為中文，開始於十六世紀的末葉。由於宗教熱忱的鼓舞，耶穌會士發軔譯事於前，新教傳教士繼起於後。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翻譯一事成為中國政府走向近代化的一種特殊措施，因此翻譯的題材和原著的來源，常常反映出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大勢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至於各時期譯書的性質和數量，也反映出譯書的動機和知識界興趣的一般趨勢。

近代中國的許多政治家和知識界的領袖，每多不諳外國語文，他們的西方知識，大多來自中文譯本。從清末以來的各種譯書目錄，可見翻譯在中國的特殊重要性。中國學者對於目錄學的觀念，向來重視其中著錄的內容。所謂「耕章學術，考鏡源流」，實際是一種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這與現代所謂「統計目

錄學」的理論極為相似，即從分析書目的內容，進而追溯文化的長成。本文主旨即在以統計學方法，研究和分析譯書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反映出來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化所發生的影響^①。

一、耶穌會士的譯者

十六世紀末葉，西方知識在中國的出現，標誌着從佛教傳來以後第二次外來文化的大輸入，在緊接着的兩個世紀中，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國籍的耶穌會士參與翻譯西書為中文的工作，先後譯書四百多種，所涉及的範圍，對中國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識領域。這些譯著有半數以上是關於基督教義，三分之一是各種科學，其餘是關於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學。因此很明顯，耶穌會士譯書的主要動機是爲了傳揚教義，在會士們的譯著中，最早是羅明堅(Michel Ruggieri)的「聖教實錄」，此書在一五八二年撰成，一五八四年在廣州刊行，是西方人用中文撰述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書。一五九六年利瑪竇(Matteo Ricci)在他的「天學實義」中，將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相聯繫，從中國經典中採集了許多支持基督教教義的引證來加以引伸。又爲了適應中國人對天文和數學的重視，更翻譯這方面的西方著作，藉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地位。當一六〇七年「幾何原本」第一次在中國印行的時候，會士們認爲此書的出版，「正合時機，藉以降低中國人的自傲心理；因爲雖名儒俊彥，亦得承認，他們閱讀一本印着中國文字的書，雖一再鑽研，仍不曉其意義^②。」

一些具有西方科學知識的中國學者，先後幫助耶穌會士進行譯述工作。那時通常譯書的辦法，是由西人口述，華人筆錄，前者稱爲「口譯」或「授」，後者稱爲「筆受」或「演」。在這些中國學者中，徐光啓於一六〇五年開始和利瑪竇諸人合作，翻譯科學著作不下十種。李之藻亦致力於科學研究，他所編的「天學初函」(一六二九年)，是最早的一部關於西方學問的中文叢書。王徵致力於應用科學的研究，探尋西方機械設計的知識來改進農具，在他的譯述中，有些專門名詞和術語，至今仍在沿用。這一時期譯述的數量和性質，請參閱下表：

耶穌會士的譯述（表一）

1584——約1790

譯 述 種 數					
科 目	十六世紀	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總 數	百 分 比
基督教（或天主教）				251	57
聖經	—	3	3	6	
神學	6	119	18	143	
儀式	1	49	9	59	
史傳	—	23	6	29	
雜錄	—	11	3	14	
人文科學				55	13
哲學和心理學	1	7	1	9	
倫理	1	9	—	10	
政府	—	2	—	2	
教育	—	4	—	4	
語言和字典	2	6	1	9	
文學	—	1	—	1	
音樂	—	1	1	2	
地理和興趣	1	9	3	13	
雜錄	—	5	—	5	
科學				131	30
數學	—	16	4	20	
天文	—	83	6	89	
物理	—	6	—	6	
地質	—	3	—	3	
生物和醫學	—	8	—	8	
軍事科學	—	2	—	2	
雜錄	1	2	—	3	
總計	13	369	55	437	100

附註：①表中所列數字僅代表個別譯述的或原稿，重印的版本不包括在內。

②資料來源：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34), 2 vols.; Henri Bernard, "Les adaptation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eens, 1514-1688," *Monumenta Serica*, 10 (1945), 1-57, 309-88.

十八世紀的譯著，多係關於神學方面的；同時他們又致力於將中國經籍彙譯為西方語文。但有一項成就特別重要，便是在十八世紀初期，會士們集體繪製了一部中國全圖，即「皇輿全覽圖」。從一七〇八至一七八年，先後有十多位耶穌會士參與是項工作。這是我國首次作全國性的勘測地形，該圖成為後來繪製中國輿圖的主要藍本③

二、新教傳教士與譯書

經過一段幾十年的中斷時期，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新教傳教士繼起耶穌會士留下來的的工作。雖然他們大體上遵循耶穌會士譯書的方式和技巧，但譯述的性質和品質頗不相同，耶穌會士多和文人大夫相交，而新教傳教士主要和商人及平民往來。因此傳教士的譯著，大多是為傳教用的通俗性小冊子和學校課本。雖然數量很多，但他們譯述的品質不能與耶穌會士的相比。這或許是新教傳教士除了醫生以外，不像耶穌會士在科學方面都有相當的素養，而他們所合作的中國人士，又大多不是卓越的學者。在一八一〇和一八六七年間，所有傳教士的譯著，除了百分之十二涉及西方科學和制度外，其餘全係有關基督教教義的譯述④。下頁附表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此一時期中文譯述的大致情況：

這些傳教士的譯著，多由教會自辦的印刷所出版，最初在中國的轄區之外開辦，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之後，便遷移到中國的各口岸城市。在一八九五年至少有十四處設有教會的印刷機構。最早從事譯印工作的是倫敦傳教會印刷所，原由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於一八一八年前後在馬六甲成立，與英華書院同屬一系統。這印刷所後來遷到香港，再移到上海，以墨海書館名稱從事譯印。一八四七年，該館在偉烈亞力監督之下成為教會的編譯和出版中心，直到後來由美國長老會印刷所接辦。這間美國長老會印刷所原於一八四四年在澳門成立，一八六〇年遷移到上海，在該地以美華書館名稱從事譯印，由姜別利（William Gamble）任監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的譯述（表二）1810—1867

出版種數				
科 目	文 言	方 言	總 數	百分比
基督教			687	86
翻譯聖經	28	37	65	
註釋聖經	30	3	33	
神學	344	74	418	
使徒傳記	11	37	48	
聖教問答	37	16	53	
祈禱	17	14	31	
聖詩	18	21	39	
人文科學			46	6
政府	2	—	2	
經濟	2	—	2	
語文和課本	11	8	19	
歷史	6	—	6	
地理	14	3	17	
自然科學			47	6
數學	8	1	9	
天文學	6	1	7	
曆書	12	—	12	
物理學	4	—	4	
植物學	2	—	2	
醫學	13	—	13	
雜錄	13	2	15	2
總計	578	217	795	100

附註：①表中數字僅代表書籍和小冊子，雜誌上的翻譯文章未包括在內。

②資料來源：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314-31.

督。從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五年間，美華書館出版品的總數，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關於醫學、科學以及字典和教育方面的譯著。另一從事譯印較著名的教會組織，是一般所熟知的益智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後易名為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ry Society for China）。該會為韋廉臣於一八八七年創辦，後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繼續主持，目的在編印一套適合教會學校適用的課本和普通讀物。廣學會因出版若干刊物而著名，如「萬國公報」，是一種政治和宗教性的月刊，由林樂知（Young J. Allen）主編；「益智新錄」，是一種科學月刊和「中西教會報」。至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一八三三年創刊於廣州，是教會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種華文雜誌，後由廣學會繼續刊行。教會的出版物，起初沒有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因為他們認為那只是宗教性的宣傳品，據說這種態度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有所轉變。因廣學會出版了一部「中東戰紀本末」，由林樂知編撰，報導翔實可靠。後來李提摩太譯了麥肯濟（Maokenzie）的「泰西新史攬要」，據說曾銷到一百萬冊。教會為了傳教，需要大量的出版品，特別是「聖經」，於是他們試用西方活字版的技術來印刷中文，鐫刻字模，澆鑄中文鉛字和使用印刷機。因此，鉛印術和石印術二者對近代中國出版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⑤。

三、政府和私人的譯書機構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政府機構也開始從事譯書工作，因而翻譯的趨勢有了很大的轉變。這時期的顯著特點，是政府主辦譯事，人們亦瞭解到西方科學知識的重要。雖無西方的觀念對於既成秩序自有潛在的危機，但西洋的技術對於國防的需要，更是急不容緩。因此，譯書的動機，多半由於政治和經濟利益所促成。下頁表三可以看出，當十九世紀後半期，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譯品大為增加，構成此期譯品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些譯本半數以上是譯自英文，其餘譯自德、法、俄和日本等國文字。政府設立各種機構來訓練通事和譯書人材，

十九世紀後期譯書的科目和語文(表三)

約1850——1899

語 文									
科 目	英	美	法	德	俄	日	其他和 不詳	總計	百分比
哲學	5	1	—	—	—	—	4	10	1.8
宗教	3	1	—	—	—	—	1	5	1.0
文學	1	1	—	—	—	—	1	3	0.5
藝術	1	—	—	—	—	—	1	2	0.3
史地	25	10	—	1	2	16	2	57	10.0
社會科學	23	5	2	6	—	6	4	46	8.1
自然科學	96	26	3	2	—	32	10	169	29.8
應用科學	123	33	6	16	—	29	23	230	40.6
雜錄	9	5	1	4	—	3	23	45	7.9
總 計	286	82	13	29	2	86	69	567	
百分比	50.5	14.5	2.3	5.1	0.3	15.1	12.2		100

附註： ①表中數字係代表種數，雜誌上刊載翻譯文章未包括在內。

②資料來源：徐以孫，東西學書錄（上海，一八九九），二冊。此書錄在一九〇二年增訂本中，增入三〇〇種；因該書未能得見，故未檢閱。

並遣送留學生出國深造。若干具有中文和西文能力的人都成為職業性的翻譯人員。而且，因印刷成為有組織的企業，譯品易於出版，並透過譯事學校和政府機構，更能達於廣大的讀者，因而譯品較前有更廣泛的影響。翻譯的方法和技巧，也在廣泛的討論，如題材的選擇，名詞的標準化，以及各種翻譯的分工等。

政府從事翻譯西方資料開始於一八三九年，當時林則徐在廣州雇用一批翻譯人員，從事翻譯西書和報章上有關洋人的意見和活動，以作情報；特別搜集有關瓷器、茶葉、軍事和鴉片的資料，以進呈御覽。另外編有一份「華事夷言錄要」，即是從外國出版品上搜集關於中國報導的摘要。由袁德輝等負責選材和譯述。這些譯文的一部份後來收入「四洲志」（一八四一年），經魏源重編，並增入一些譯自外國雜誌的資料，成為通行一時的「海國圖志」（一八四四年）。半世紀以來，此書一直被視為了解西洋最權威的編著，在中國和日本都廣為流傳。

中國經過幾度戰敗之後，乃於一八六一年決定設立一所語文學校，定名為同文館，以造就適任的通事和譯書人材^⑥。這所學校後來陸續擴展，增添了多種外國語文，並新開關於科學和西洋制度的課程，根據一八八八年「同文館題名錄」所記載，該年有註冊學生一二五人，教習十九人，其中八位屬英、法、德、美等國國籍。校中圖書館，有中文書三〇〇冊，西文書一七〇〇冊，並有各種語文的報紙和雜誌。一八七三年設立一所印刷局，出版譯為中文的外國著作，並將此等譯品分述各省當局，轉發當地官員閱讀。在這些譯品中，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首次介紹了萬國公法和西洋法典。一八六九年後，丁氏任該校總教習（即校長）。其他譯品，包括有西洋制度、歷史和科學的著作。這些譯品都用上等紙張印刷，有的進呈御覽。但就數量來說，同文館譯書的貢獻較少，在四十年漫長的時期中，大約僅譯了二十六部著作，包括未譯完和未出版的在內。

一九〇一年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合併，一九〇三年在該校設立了一所譯學館，有學生一二〇人，授英、法、德、俄、日五種語文，並增添科學、法律、和外交程序的課程。但訓練期限較同文館的八年縮短為五年。該

館特色之一，是成立一文典處，主持編纂正規字典，分英、法、德、俄、日五種語文。每種語文有三種字典，即中文——外文、外文——中文、和一種科技名詞的詞典；每字都注有發音和定義。但因該館壽命不長，故成就有限。

上海江南製造局於一八六九年將其成立不久的翻譯館與廣方言館合併^⑦，後者係一外語學校，一八六三年成立於上海。這二機構，一從事教學，一從事編譯，合作甚為密切，較其他官方翻譯機構產生了更多的譯品。這翻譯館，到一八七一年，出版了許多關於科學、工程、軍事、和其他學科的譯本。開始擔任翻譯工作的，是華衡芳和徐壽。其他西籍和中國學者參與是項工作的，還有傅蘭雅(John Fryer)、瑪高溫(Daniel J. McGowan)、林樂知(Young J. Allen)、舒鳳(一位由美國歸國的醫學生)、趙靜涵(一位研究西方醫學理論的中國醫士)、賈步緯(一位數學家)、和徐壽的兒子徐建寅(他於一八七九和一八八四年間曾參觀歐洲一些工廠)。就翻譯的數量和涉及科學之廣來說，諸人中以傅蘭雅的貢獻最多。他和華、徐、趙及其他諸人合譯關於科學的著作達一百三十餘種。據傅氏於一八八〇年的報告中稱，江南製造局譯書有一五六種，其中出版了九八種，共發行了三一、一一一部。該局的譯印工作繼續到本世紀之初，從一八七一至一九〇五年間，出版譯書共一七八種。^⑧

十九世紀末葉，譯書風氣的熱烈，反映在若干私人所支持的會社，專門從事翻譯西書。其中較重要的有傅蘭雅於一八七五年成立的格致書室，譯印了若干關於科學和技術的書籍，其中如「須知」和「圖說」最為通行。另一私立機構是譯書公會，在一八九七年左右由一批中國學者所創立。該會的目的在專譯西方歷史和制度的重要著作，因官方已專注於翻譯自然和應用科學的書籍。預定從法、英、日文等書籍中，選譯三十部著作，分期刊載於「譯書公會報」，該雜誌每期發行三千份^⑨。

經過維新運動的激勵，一八九五年後若干大學和出版社都參與譯事。如上海的南洋公學，太原的山西大學，以及北京的京師大學堂都設立了翻譯科。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之初，至少有四十所官辦和私人經營的出

版機構從事譯印。如新學會社專譯農業書籍、廣智書局專譯歷史和制度的著作、「小說林」期刊則專譯小說。出版社紛在上海設立，使該地薈為中國出版業的中心。

四、二十世紀的譯書

二十世紀在中國史上是一革命的時代，各種思想制度與文化生活都有激烈的改變。反映在譯事上的是學術興趣的轉變。過去數世紀以來，注重翻譯自然和應用科學，現在轉而熱中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譯述。這新的趨向不僅對現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顯示中國知識分子日益瞭解到要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不能全靠軍事和技術的知識，還須具有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組織的綜合知識。

當本世紀初期，較多的翻譯是在社會科學方面，從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幾乎半數的譯品是關於史地、政治、經濟，尤其教育制度方面的著作。當時一般人關心制度的改革，和日本維新政策的影響，對翻譯自有決定性的因素。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華的侵略態度，經過一段時期的激憤之後，翻譯英文的著作再居首位。下頁兩表可見到此一轉變和該時期譯書的情形。

本世紀中，大多數的譯品是由中國人自己譯的，沒有外籍人士參與。多數中國譯者都曾受過外國語文的訓練，並各自翻譯自己專門的學科。若干譯者都成為職業性的，對於介紹西方思想、文學和技術，他們都有很大的貢獻。其中嚴復較其他早期譯者有完全不同的學歷背景，他曾受中國古籍的薰陶，也受過新式教育，並去英國深造，且結識一些西方哲學家。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嚴氏深受刺激，乃於一八九六年開始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由此，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的理論首次介紹到中國。該譯本於一八九九年出版，一時風行，並採作學校課本。嚴氏又譯亞丹斯密斯的「原富」（一九〇二年），穆勒的「羣己權界論」（一九〇三年）和「名學」（一九〇五年），斯賓塞的「羣學肆言」（一九〇三年），及甄克思的「社會通詮」（一

二十世紀初期譯書的科目和語文(表四)

1902——1904

語文和國別										
科 目	英	美	法	德	俄	日	其他和詳	總數	百分比	
哲學	9	2	—	1	—	21	1	34	6.5	
宗教	1	—	—	—	—	2	—	3	0.6	
文學	8	3	2	—	2	4	7	26	4.8	
史地	8	10	3	—	—	90	17	128	24.0	
社會科學	13	3	3	7	2	83	25	136	25.5	
自然科學	10	9	5	—	—	73	15	112	21.0	
應用科學	3	3	3	14	—	24	9	56	10.5	
雜錄	5	2	1	2	—	24	4	38	7.1	
總 計	57	32	17	24	4	321	78	533		
百分比	10.7	6.1	3.2	4.5	0.7	60.2	14.6		100	

資料來源：顧錫廣，譯書經眼錄（杭州，1935）二冊。此書目是繼續徐以孫的東西學書錄，一九二〇年的增訂本。

民國時代的譯書（表五）

1912—1910

語 文 和 國 別									
科 目	英 美	法	德	俄	日	其他和不詳	總 數	百 分 比	
哲學	164	17	31	11	22	3	248	4.7	
宗教	97	10	5	—	11	—	123	2.3	
語言	25	2	4	1	1	7	40	0.8	
文學	505	210	101	239	174	233	1,462	27.6	
藝術	24	4	2	6	15	—	51	1.0	
史地	491	37	29	21	53	10	641	12.0	
社會科學	763	72	118	42	351	5	1,351	25.5	
自然科學	585	25	46	3	112	—	771	14.6	
應用科學	311	2	41	3	217	—	574	10.8	
總 數	23	2	—	—	13	—	38	0.7	
總 計	2,988	381	377	326	969	258	5,299		
百分比	56.4	7.2	7.1	6.2	18.2	4.9		100	

附註：①表中數字僅代表譯書，雜誌上譯文未包括在內。

②資料來源：平心編，全國總書目（上海：生活書店，1935）。此書目從1912—1940所出版新書計二〇，〇〇〇種中，刊出4,159種譯本；又圖書季刊英文版，1935—1940，收錄書本1,140種。

一九〇四年），孟德斯鳩的「法意」，和耶芳斯的「名學淺說」（一九〇八年）。這八種西方的經典著作，對現代中國思想產生極大的影響。在翻譯技巧方面，嚴氏創立了信、達、雅的標準，並用古文翻譯。爲了迎合讀者心理，使人不致感到這些新觀念全係舶來品，他引用中國典籍中的語句作爲解說，可是這種翻譯方法，常會曲解原意。當時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吳汝綸，在給嚴氏的信中曾批評道：「執事若自爲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爲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傳、皆宜以原書所稱西方者爲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⑩

早期所譯小說中，以林紓對中國讀者影響最大，在他之前，傳統中國文學中，小說沒有地位。甚至在二十世紀初期，除非這小說是既富興趣，又長於文章，否則少有人閱讀。林紓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的。因他不諳外國語文，全靠他的合作者選材和口譯，由他筆述。合作者固非全是上駟之材，因而他的譯品常被譏爲選材既非上乘，而譯筆又每多不當，只是根據一個外國故事的情節，用中文重述而已，這是意譯而非翻譯。但這些缺點並不能削減林氏對廣大讀者的影響力。當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之初，林譯西方小說不下一七一種^⑪。雖然林譯小說大多爲後來譯者重新翻譯，但首先介紹西方小說給中國讀者的，還是要歸功於林氏。

五、對外關係與譯書

兩國間文化的交流，常繫於兩國間政治和經濟上的關係，外交關係愈密切，其文化亦愈廣泛。從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天主教羅馬教廷與中國的關係是相當獨立的，與當時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利益無大關係。但這種情況只維繫到歐洲向外擴張的第一階段。從十九世紀末葉直至當代，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對外關係中四個不同的階段。在這時期中，中國和英、日、美、俄四國的關係特別密切。這四個階段正符合中國近代史上的演變，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至一八九五年戰爭，將近半個世紀，英國在中國的勢力佔着優勢。這時期的譯品正反映出

這個事實，從一八五〇至一八九九年，五百六十七種譯品中，百分之五十是譯自英國的著作。早期的譯者如馬禮遜，米憐，麥都思，郭實獵，繆耳赫德（Murhead），偉烈亞力和其他請人的譯述，大多與英國在華的政治經濟利益有關。

從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因日本維新後的崛起，這對中國是一大刺激，由於中國萎弱，面對西方列強的威脅，改革運動的主要目標在仿日本。因而在本世紀之初，有一萬名以上的學生成羣東渡^⑫。更有強談學習東洋和自日文翻譯遠較從西文直接翻譯為便捷者^⑬。結果，這一時期從日文翻譯的譯品，高達總數百分之六十。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引起對彼邦的仇視因而導致中國再轉向西方國家。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贏得中國人士的好感，學生們傾向留美代替了留日。密切的文化關係，引致大量翻譯美國科學和文學作品。雖然沒有數字將美國著者從英國著者分別出來，但自民國成立至一九四〇年以來，英美作品構成品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十九世紀，中國與俄國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關係，不如英、日、美三個國家那麼重要。直到一九二〇年間，才有少數俄國文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譯為中文。從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譯自俄文的譯品約有六五〇種，如以百分之六十七的英文譯本來比較，它僅佔此期譯品總數六、六八種中的百分之九・五。

其他西方國家，與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關係都較疏遠，譯自德文和法文的譯品數目，也較英、美、日為少。如表三、四、五所示：譯自法文的共計四一一種；譯自德文的四三〇種。此外譯自其他國家的譯品，至少代表二十二個國籍的著者^⑭，其中以譯自義大利的較多^⑮。

在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過程中，日本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日文譯為中文的歷史可追溯到一八八〇年，但翻譯的重要時期開始於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國學者譯了許多日文著作，特別是關於經濟、政法、農業和醫學方面的。日本文學創作，由歸國的留學生大量介紹，譯了許多日本名作家的

作品，每人常譯有五至十種之多。一九二七年左右，左翼文學在中國興起，日本資料提供大批的翻譯素材。大約從一八八〇至一九四〇年間，譯自日文的二、二〇四種著作中，最高的百分比是社會科學，其次是自然和應用科學，以及文學和其他學科。

因日文對於中國較西文易於閱讀和翻譯，許多西方的著作，重新由日文譯為中文，如雷馬克的「戰後」，考茨基的「馬克斯的經濟學說」，以及魯迅所譯的俄國小說，都是由日文轉譯而來^①。有一位中國作家曾批評道：在日文譯本中的一些更改，刪節和錯誤，再轉譯為中文時，於是就有更多的變動、更改和錯誤。像這樣的譯品，怎能保持它原有的形式呢？假如一部俄文作品譯為德文或英文時已有一些錯誤，再譯為日文時，又增加一些錯誤，於是從日文譯本再譯為中文時，一定是集錯誤之大成了^②。

六、結 語

從十六世紀末葉至本世紀四十年代，除了發表在報刊上許多翻譯的文章以外，估計譯書的總數應超過一萬種，其中大多數係近三、四十年來的產品。雖然本文所搜集作統計的資料未能完備，但相信表中數字足以代表某些學科和語文在各時期的一般趨勢。這些譯品的確切影響，儘管不易作出正確的估計，但將所涉及的學科和語文加以分析和綜合的敘述，對於瞭解譯書一般的實際情況和趨勢，至少能有一些幫助。

翻譯的題材反映一個時期的需要和興趣，很明顯，人文和社會科學在過去譯品中佔主要地位，其總數達百分之七十，而自然和應用科學僅百分之二十七，下表六或可說明，一方面因人文科學事實上較技術知識更為基本和重要；另一方面，人文和社會科學是一種累積的知識，其所蘊涵的舊知識，不像在科學和技術的領域內，可為新的知識所代替。

總計譯品所涉及的科目，文學所佔的比例最高，這大量遡譯西方文學作品，大半由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動

*此二期中，譯書數字有彼此再覆處，其中屬社會科學者二種，自然科學六種，及應用科學五種，共計一三種。

機，而非僅為怡情遣興。因文學是最通行的大眾閱讀媒介，許多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它是教育廣大羣衆的最好工具^⑮。因此，大量輸入西方文學作品作為鼓吹社會改革的媒介，就不足為異了。

翻譯的素材代表二十五個國家以上的著述，以英、日、俄文的作品為最多，其中有些是轉譯而非譯自原文。有些所謂原著，事實上是根據外國著作的一種或多種底本編譯而成。有些譯本並非譯自該科的最佳選本；且同樣一部作品，有兩種或多種的譯本，如此，在譯本的品質上，雖然可以比較出優劣，但留着其他重要著作未譯，而產生許多重複的譯本，畢竟是一種人力浪費。翻譯在最近二十年來（按：此指三十和四十年代），無論在題材和技巧方面，都有相當的進步，雖然有待改進的地方仍然很多，但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 ① 本文所指翻譯，係由原文譯為中文而不更改其內容者為限，除早期耶穌會士的譯述難以分別其著譯外，其他稱為編訂之作品或期刊中之翻譯文章，均不在內。
- ② Henri Bernard,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 tr. by Chalmers Werner (Peiping: Henri Vetch, 1935), P. 68.
- ③ 關於耶穌會士在學術上的貢獻，參見方豪「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譯館，一九四八年）；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二九年，第一本第三分冊；范適「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上海：中華醫史學會，一九四三），二卷頁一上——三上；惠澤霖（Hubert Verhaeren）著，景明譯，「王徵與所譯奇器圖說」，上智編譯館館刊（一九四七年），二卷一期，頁二六——三六；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922);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Peking, 1943)。
- ④ 關於新傳教士的譯述，見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1820).
- ⑤ 關於教會出版事業，參見 Gilbert McIntosh,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PP. 35-58; Albert J. Garnier, *A Maker of Modern China* (London: Garey Press, 1945), P. 77; K. T. Wu (吳光清) "The Development of Typography in Chin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brary Quarterly*, 22 (1952) PP. 288-301; 楊壽清，中國出版界簡史（上海：永祥印書館，一九四六）。
- ⑥ 關於同文館的創立及譯書經過，參見 Knight Biggerstaff, "The 'Tung Wen Kua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1934), PP. 307-40. 同文館題名錄（為該館校曆，於一八七九年開始編印，以後每隔數年編印一次），譯學館開辦章程（北京，一九〇三年），頁一八。
- ⑦ 關於江南製造局譯書，參見馮桂芬，顯志堂稿（一八七六年），卷一〇，頁一八——二〇。John Fryer, "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 *North China Herald*, 24 (January 29, 1880). 格致彙編，第三年，第五——八卷（一八八〇年）；周昌壽，「譯刊科學書籍考略」，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頁四二五——八。
- ⑧ 其中有關於自然科學者六六種，軍事三八種，工程和製造三五種，醫學一一種，農業七種，歷史和制度二二種。關於江南製造局譯書全目，參見魏允恭，江南製造局記（上海，一九〇五年），卷二，頁一五——二二。
- ⑨ 譯書公會報，第一號（一八九七年）。
- ⑩ 王遽常，嚴幾道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頁三五。
- ⑪ 林譯小說約一七一種，所包括的作家，有英國九九人，美國二〇人，法國三三人，俄國七人，瑞士二人，

- 以及比利時、西班牙、挪威、希臘和日本各一人，尚有五人國籍不明。見阿英，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頁二七七——八〇。
-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頁四六。
-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一九三七年），卷二〇三，頁一五上。
- 楊家駱，一九二三年度圖書年鑑，第六編，頁一——四四四。
- 15 Pi Shu-t'ang, Catalogo di opere in Chinese tradotte dall' Italiano o riguardanti L'Italia i Saggio di bibliografia (Peking: Centro Culturale Italiano, 1941).
- 16 Walgang Franke and Dschang Schau-dien, Titelverzeichnis Chinesischer nebersetzungen Deutscher Werke (Peking: Deutschlang-Institut, 1942).
- 17 蔣光慈，異鄉與故國（上海：現代書局，一九三〇年），頁一三一。
- 18 見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一八九八年），飲冰室合集，第二冊，頁三四——五；又「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一九〇二年），同上書，第四冊，頁六——九；魯迅，吶喊（上海，一九二六年），序頁四。

唱片

書評書目社總經理

中國現代民歌集 • 余光中詩 楊弦曲 五〇元
中國當代音樂作品（四大張・附說明書）

賴德和主編

二五〇元

西出陽關 • 楊牧等詩 楊弦曲

五〇元

陳達和他的歌 • 陳達唱

八〇元

楊弦的歌 • 楊弦主唱（錄音帶）

一〇〇元